

社会正义与生态和谐

——生态社会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探析

徐朝旭

摘要: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摆脱生态危机的途径, 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必然联系, 展示了社会公正与生态和谐内在统一的未来社会的图景,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生态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和谐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06)8-063-03

作者: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哲学博士生; 福建, 厦门, 361005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当代生态危机, 认为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 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 人类就无法摆脱生态危机的困境。生态社会主义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不公与生态不和谐之间的内在关系, 把解决生态问题和社会主义前途结合起来, 从而给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 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辩证关系思想: 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生态问题的方法论视角

生态社会主义者不满足于那些把生态问题归咎于人口过剩、工业范式或人的贪婪欲望等的观点。他们认为, 这些观点缺乏对生态问题的深层分析。因为, 人口过剩和人的贪婪欲望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 而生态困境也不在于工业范式, 而在于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由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和“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造成能源的枯竭和环境污染。因此,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生态问题, 才能真正找出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生态中心主义展开了批判。生态中心主义想从纯自然的角度界定生态问题, 但是, 自然和生态平衡的定义是与人的需要和人的行动有关的定义。生态中心论者认为自然是价值的源泉, 自然规律是一种在人类社会之上的力量, 它要求人们尊敬与敬畏自然的内在权利与价值, 人的活动不能侵犯和冒犯自然。这实际上是将自然神秘化, 把人类社会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因此, 生态中心论没有摆脱社会——自然关系的二元论的樊篱。而马克思主义坚持了社会——自然关系的一元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循环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中不断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人类社会通过劳动实践把自己和自然界联系起来。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在实践上, 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 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 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 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 马克思主义不否认有一个客观的、先于人的自然界存在。马克思承认人类对自然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的依赖, 并作为他的“对生态规律客观存在敏感性”的证据。^②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本质上却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类社会与自然联系的形式。因此, 生态危机是特定历史阶段生产方式的产物。正如史密强调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只要“第二”自然一旦产生, 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就由交换价值和使用寿命所调节, 因而, 我们如何利用自然与各种使用的方式的费用相关”^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土地耗竭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指出: “在资本主义农业中, 所有的进步是在技艺上的进步, 它不仅掠夺了劳动力, 而且掠夺了土壤; 所有在既定时间内提高土壤; 都是一种毁灭性那种肥力的持久源泉的进步”^④。

二 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必然联系: 生态社会主义对当今生态危机的深层思考

生态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上寻找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生态危机根源, 它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产生了异化。自然界与人原来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它是劳动者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 并生产出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场所。但是,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 工人则一无所有, 这就产生了工人与自然的分离。“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性自然界, 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 第一, 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对象, 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 第二, 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给他提供直接意义上的生活资料, 即劳动者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⑤工人为了使自己和劳动对象联系起来, 他必须出卖劳动力, 并得到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因此, 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对象的奴隶; 首先, 他得到劳动的对象, 也就是得到工作; 其次, 他得到生存资料。因而, 他首先作为工人, 其次, 作为自己肉体的主体, 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

作为肉体的主体的生存,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是工人。”^⑥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是互为前提的关系。对于工人来说,自然是外在于他的东西,只有在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关系中,工人才能与自然发生关系,而对于资本家来说,自然是他们控制和统治的对象,是他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

由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改变自然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内在地隐含着产生和加剧生态矛盾的种子。高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存在着经济合理性和生态合理性的不相容性。所谓经济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利润的最大化和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而生态合理性则是指生活得更好、劳动和消费更少,显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这两者是无法相容的。由于资源保护、再循环和污染控制将导致更多的成本,企业不可能按反对其自身利益的、着眼于集体和长远利益的生态化方式进行生产经营。因而,企业总是尽量使收益内在化,成本外在化,让社会来承担环境破坏的生态恶果。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产生了生态矛盾,而且加剧了生态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是一种运动,它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够不断地榨取剩余价值。资本一旦停止运动,就丧失了它的生命力。而资本的运动,将使资本主义生产赖以存在的资源基础持续性地扩大,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如果说资本是物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么,资本家则是人格化的资本。由于内在的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的动机,和外在的强大的竞争压力,资本家总是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同时,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是低于他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⑦。这就造成了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而先进技术的采用,生产效率的提高,又使这一矛盾更加恶化,因为,它们降低了每一单位产品的工资成本。于是,资本家不得不创造新的需求来抵消需求的下降和扩大需求。而且,资本家为了解决先进技术的采用而导致的平均利润率下降的矛盾,千方百计地通过廉价原料降低成本,通过广告、营销和生产革新(或说服人们花费他们更多的积蓄)扩大需求,或扩大市场和生产的空间,以保证其利润的实现。^⑧这些因素导致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前者表现为技术规模越来越庞大,生产和人口越来越集中,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多;后者表现为消费变成了满足生产的手段,人们的消费活动受广告的操纵,而不是出于自身真正的需要,人们把消费的方式和多少当作衡量幸福的标准,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超出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在这样的病态社会里,人格受到了扭曲,自然环境遭到了破坏,生态矛盾不断加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必然引起生态危机。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或生态的后果”^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展,资本主义国家对人类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实行肆无忌惮的掠夺,并且把高耗费、高污染的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这样,不仅西方发达国家持续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环境质量的持续的下降的基础上,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绿色城市也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

树木的毁坏和有毒物质的倾倒在实现的,正好象一个具有精美外观的饭店背后隐藏着日益肮脏和令人恶心的后房和厨房。^⑩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成本的外在化部分地转嫁给未来,后代不得不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这就产生了约翰斯顿所说的“生态帝国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者以生态危机理论补充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作用形成的危机理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他们认为,考察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要看到资本主义固有的结构性矛盾,而且更要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在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系统等方面造成的危害。他们认为,当代全球生态危机从涉及的范围上看,是全球整个生态系统的危机;从危机的性质看,是全球性的经济、政治、社会综合危机。迈克尔·博德指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引发经济危机的内在矛盾仍然存在;由于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不断扩大,社会危机表现突出;而生态危机又演变成全球性的危机,因而,资本主义现已陷入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三重危机”。威廉·莱易斯指出,过度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造成的,过度消费是资本主义使人异化的结果。二者相互作用,造成了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主要社会矛盾。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是挥霍性工业生产的根源,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本阿格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但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生态危机。他说:“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⑪。

三 社会公正与生态和谐:生态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扩张性和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终摆脱生态危机的困境。他们主张建立一种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基础上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将被克服,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占有制,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基础。戴维·佩珀指出,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者以联合的形式对社会生产资料重新占有,实现对自然的控制,因此,异化可以克服。这种控制“并不蕴涵着一个专横的主仆关系,事实上给予人类在追求合法需要过程中明智地改变自然能力的一种技巧和才智”^⑫。瑞尼尔·格伦德曼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支配概念不同于统治概念,支配并不意味着征服与破坏,相反,征服与破坏正是缺乏支配的表现,因为支配标志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他甚至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范围越广能力越高,将会越自由。由于我们重新成为自然的主人,“从自然中创造对象时,我们可以完全根据它们在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有用的或舒适的来制造产品。以这种方式使自然对象化满足了其他人的需要,这完全不同于满足一个消费社会中被创造的‘需求’”^⑬。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从事创造性、休闲性的活动,成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由存在。同时,由于人与自然

的关系实行集体的、自主的、自觉的控制,可以使社会生产真正符合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特别是生态利益,最大限度地消除或避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社会公正和生态和谐的社会。在经济方面,未来社会将是一个“社会生态经济”模式的社会。这种经济模式是对传统工业主义的超越。传统工业主义强调经济理性高于一切,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势必导致贫富不均,经济浪费和生态危机。为了解决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互相矛盾,必须进行生态重建,使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这是生态社会主义模式与以往社会主义模式最大的区别。安德烈·高兹认为,社会生态经济意味着范式的转换,其目的是减少经济合理性和商品交换适用的范围,使发展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就经济体制而言,瑞尼尔·格仑德曼、安德烈·高兹等主张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计划生态经济。他们批评市场自由主义,但也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主张取消市场、货币与国际交换的观点是不现实的。他们强调在未来社会中,政府应用计划与管理等方式,按照人的理性合理地、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在人类真正的物质需要得到普遍满足的基础上,实现丰富多彩的需求的满足,最终摆脱经济合理性对人的制约。安德鲁·塞尔等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是必然的选择。

在政治方面,未来社会将是一个基层民主充分发展但仍将存在国家或类似组织管理的社会。生态社会主义者主张基层民主,认为基层民主的充分发展源于生产者以联合的形式实现对社会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只有基层民主才是符合社会和生态环境要求的合理的行政体制。他们抨击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同时也批评传统左翼运动的精英,因为二者都强调集中制,没有彻底实行民主原则。但是,生态社会主义不同于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国家,而生态社会主义则倡导国家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生态社会主义只是对分散化有限的支持,并认为个人自由要受到集体的限制。安德烈·高兹指出:基层民主和参与民主是重要的,与此同时国家将长期发挥社会生活管理的作用。^⑩生态社会主义还认为建立在互惠互利基础上的国际交换是国际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这是因为,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必须上升到区域的、国际的层次上解决。

在社会文化方面,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以全面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为核心,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的,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活范式。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中,人们不是为了交换价值,而是为了使用价值和人类的需要而进行生产,在生产中人们体验到创造技巧的喜悦和休息中的快乐。在改造自然和制造产品中,人们为了更有效地和有用地改造自然,努力地探索自然规律,也发展了自己的智力,同时人们还把自己变成能欣赏自己创造的产品的、具有审美情趣的人,从而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总之,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克服了阶级社会中产生的人与自身、人与其他人、人与精神和艺术乃至人与自然的疏离,成为全面的、自由的、健康的和快乐的人。

生态社会主义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生态危机的必然性,努力构建不同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为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讨开辟了新的视野,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必须认识到生态和谐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自觉地将生态原则作为制度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注:

- ① ⑤ ⑥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第92页。
- ② H. L. 帕森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学》,伦敦格林沃德出版社1977年版,第19页。
- ③ ⑧ ⑩ ⑫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 140、123、92 127页。
- ⑨ [英]哈维:《后现代化的条件》,剑桥,波力第出版社1990版,第180页。
- ④参见L. 费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著作》第505—507页。
- ⑪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页。
- ⑬参见[法]安德烈·高兹:《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伦敦,伦敦出版社1980版,第15页。

(责任编辑:南 桥)

(上接 229页)

场景,但最终,在作者全方位的观照中,历史终究不是一个一个碎片。不仅如此,作者走得更远。历史在作者的眼中是可能有多种选择的,而已作的选择既构成了历史,也留下了经验和反思的地方。

作者是个坦诚的人,在这里,作者表现出一贯的客观与冷静,有价值的东西常常是无功利的,就像美常常是无功利的一样。这本书的意义却在于历史的沉淀。很多流行音乐随着流行之风而飘逝,而本书沉淀的是嫁接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思考是沉甸甸的,它会融进历史的脚步和进程。

二十一世纪是个雅俗共赏的世纪,流行音乐成了大众娱乐的一种主要方式,对它的关注也变得紧迫。但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歌手和歌曲,绝对不会停留在对某一刻空间的征服,而应该有一种征服时间的西斯弗绪式的永远前行。在各自占领

的同时,也会争取最多的文化受众。换句话说,流行音乐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流行度,它是对空间的占领,但是如果也要对时间的穿透和占领,就必须具有艺术生命力。

在流行时尚充斥整个耳膜的时代,我们是否要有经典意识?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流行音乐太容易被市场,被商业行为牵引了,至少对流行音乐艺术性的强调,可以让艺术家们保持对艺术应有的警觉。

本书作者从流行音乐出发,以特有的敏感预见到很多问题的端倪,流行音乐只是当代文化活跃的一部分,但却使我们对整个社会历史保持了一种期待。

(责任编辑:南 桥)